

古典文史基本知识丛书

经
与
经
学

蒋伯潜
蒋祖怡



古典文史基本知识丛书

经与经学

蒋伯潜 蒋祖怡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力励

* 古典文史基本知识丛书 *

经与经学

蒋伯潜 蒋祖怡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曙光印刷厂排版 亭林印刷厂印订	1997 年 5 月第一版 199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51 千 印数: 0001-5000
ISBN 7-80622-222-7 / B·4	定价: 12.00 元

前 言

我国的传统文化，其包容的内含可以很广，凡过去存在过的事物，衣食住行，几乎无不可纳入文化这个范围。但传统文化就其最基本的典籍来说，集中在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十三经（或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以及诗词、歌赋、散文等几大方面，这些可统称之为传统文化的“经典”。作为一个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中国人，有必要也有义务尽可能多地阅读学习一些文化经典著作，以了解、通晓传统文化的源流嬗变，这样才能进一步谈继承与发扬的问题。所以，经典著作的通俗化、普及化工作，便显得十分重要。

“五四”以来，有许多著名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像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顾颉刚的《尚书》翻译和《汉代学术史略》、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范文澜的《经学概论》，还有他的一些关于经学的讲演录和《文心雕龙注》等，都是杰出的成绩。这些学者中影响更为广泛的，则是朱自清、周予同和蒋伯潜。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周予同注释的《经学历史》和蒋伯潜的《十三经概论》，都已成为学习传统文化经典的必不可少的人门书。这三部书，解放后分别由三联、中华和上

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出版，并多次加印，传播很广。但后二部书专谈经学，前一部书叙述虽很全面，却稍见简略。现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决定重印蒋伯潜、蒋祖怡父子合著的原世界书局于1942年出版的“国文自学辅导丛书”中的六个分册，正可弥补这一缺陷，适应当前读者的需要，我以为这对于传统文化的普及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这六本书分别是《经与经学》、《诸子与理学》、《骈文与散文》、《诗》、《词曲》、《小说与戏剧》。据我看来，这六本书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文字通俗，深入浅出。作者把艰深复杂的内容，讲得条理清晰，明白易懂，读者很容易接受。

第二，打破旧观念，建立新思想。如把不在经典之列的小说与戏剧提升到经典的位置用专册论述介绍，对白话文学也给以应有的重视等等。

第三，立论公允，不偏不倚。对学术上的今古文、汉学宋学等学派门户之争，不任意偏袒或贬低，据实论述，读者可据此得到完整的概念，并作出自己的判断。

第四，结合实际，具体实用。作者有数十年自中学至大学的教学经验，懂得学生的不同程度和具体要求，使本书的讲解切合读者的实用（如讲诗词则详述格律、音韵）。

第五，古今中外，贯穿配合。本书的论述讲解，不仅讲古，也贯穿至今；不仅讲中国的，还配合讲外国的。正如作者自序所说，本书“以文学与学术为经、文学史与学术史为纬，而文学概论、文学批评、群经诸子及理学之内容流变皆融合于其中”，可使读者对于传统文化及其渊源流变，获得切实明白的知识。

正因为如此，我以为这六本书不仅对于想在这些内容方

面有所了解的读者有帮助,而且对于普及读物的写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范例。当然,这套书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缺少关于史书、史学及其他文史专门知识的讲解与叙述,读者可用别的书(如《中国历史研究法》、《经典常谈》等)来补充。好在本书各个分册相对独立,与整体无妨。

本书作者蒋伯潜(1892-1956),浙江富阳人。早年从钱玄同、马幼渔为师,又曾问学章太炎、梁启超门下,深研经学。三十年代末,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兼任世界书局特约编审。抗战胜利后曾出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解放后任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并多次被选为省、市人大代表。蒋祖怡(1913-1992),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8年受聘于浙江大学文学院。解放后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系副主任,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教学。这套书的出版,也是对这二位前辈学者的纪念。

钱伯城

1996年12月,于上海

目 录

第一章	所谓“经”	1
第二章	经今古文与焚书坑儒	12
第三章	《诗》	22
第四章	诗与乐	35
第五章	《书》	46
第六章	《礼》一——《仪礼》与《周礼》	57
第七章	《礼》二——《礼记》	68
第八章	《易》	80
第九章	《春秋》一——《公羊传》与《谷梁传》	91
第十章	《春秋》二——《左传》	102
第十一章	《论语》	113
第十二章	《孝经》与《尔雅》	126
第十三章	《孟子》	137
第十四章	六经的传授	147
第十五章	经今古文的分合	158
第十六章	经学的衰落一	169
第十七章	经学的衰落二	179

第十八章	经学的中兴	190
第十九章	经今文学的复活	201
第二十章	经学的附庸——文字学	212

第一章 所谓“经”

我国古书，有几部特别被人尊崇的，其名曰“经”。据《庄子·天运》，孔子尝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六经”之名见于古籍，当以此为最早。这六种书所以特称做“经”，有两种说法：

(一)经是官书。我国古代，学在王官，私人无著述(参阅《诸子与理学》)，所谓“经”者都是官书，由史官掌之。《左传》记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鲁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昭公二年)，此《易》与《春秋》在史官之证。《周礼》言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外史，春官宗伯之属)，《左传》载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昭公十二年。按《尚书》疏引贾逵说：“《三坟》，三皇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国之戒。”)，此《书》在史官之证。《诗序》云史克作《鲁颂》，《左传》云倚相诵《祈招》，此《诗》在史官之证。《周礼》言太史以礼书协事，小史以时读礼法(皆春官宗伯之属)；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是周之征藏史；访乐于苌弘，苌弘也是周史，此《礼》、《乐》在史官之证。六经都是官书，所以简策特别大。郑玄《论语序》逸文(原序已亡，此据清宋翔凤

所辑)曰:“《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又曰:“《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按《盐铁论·诏圣》篇曰:“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汉书·杜周传》所云“不循三尺法”,金鹗《求古录礼说》以为是“举成数”。经书和法律都用二尺四寸的策,正因为它们同是官书。

(二)经是圣人所作。《博物志》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圣人制作”的书为什么叫做“经”呢?因为圣人之道是万世不变的常道。郑玄《孝经注》曰:“经者,不易之称。”(《玉海》卷四十一引)《释名·释典艺》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皇侃曰:“经者,常也,法也。”《文心雕龙·宗经》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种说法,完全是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为根据的。

上述两种说法,因为他们对于所谓“经”的观念不同,所下的定义便两样了。前者以为“经”是周公(旦)的旧典,孔子是一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语,见《论语·述而》篇)的学者,他对于六经只是“述”,只是整理而已,所以说“经”是官书。后者认为六经是孔子所作,孔子作六经,垂教万世,为不变之常道,所以说“经”是圣人所作。

但是《荀子》尝引《道经》,贾谊《新书》又提及汉儒谈礼的《容经》,医书中有《内经》《外经》(《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经》《外经》、《白氏内经》《外经》)、《难经》(扁鹊撰,《汉志》不载,《隋书·经籍志》始著录),《国语·吴语》“挟经秉枹”的“经”又指兵书而言,这些书既非官书,亦不是圣人所作,但也名之曰“经”,所以章炳麟谓“经”是以丝编缀竹简,本为书籍的普泛名称,和印度梵语称佛经为“修多罗”一样。这是另一种说法,却比较近理。不过自汉以

后，学者对于这几部经书特加推崇，认为是古籍中有特殊地位的，而对于它们又有两派不同的观念，所以有上述两种不同的说法了。

六经又称“六艺”，这是汉朝人的说法。贾谊《新书·六术》曰：“《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汉人称六经为“六艺”（《史记》、《汉书》皆如此，刘歆《七略》及《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便是著录经部之书的），似以此为最早（按，《周礼》保氏以六艺教国子，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者而言，与称六经的“六艺”不同）。《小戴礼记·经解》曰：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这一段话论的是“六经之教”。所谓“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絜静精微”、“恭俭庄敬”、“属辞比事”，是六经之教的效果，是六经之教及于受教的人们之良好影响，下文所说“愚”、“诬”、“奢”、“贼”、“烦”、“乱”六者，是因六经之教之失，影响于受教的人们而发生的流弊，所以下文又说到有良好的效果而无其流弊的，必是深于某经者。其意义本来非常明白，可是一般粗心的读者，往往误认“温柔敦厚”等六者是指六经

本身的性质而言，那么“愚”、“诬”、“奢”、“贼”、“烦”、“乱”六者，难道也是六经本身的缺点吗？以六经教人，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必深于六经者方能有得无失、有利无弊，这真是持平之论！

六经之用，古籍中论及者颇多，最早的似乎是《庄子》的《天下》篇：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史记·滑稽列传》也引孔子的话道：

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

《太史公自序》又曰：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义，《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滑稽列传》只引用孔子的话，《太史公自序》则先加以说明，然后以孔子的话为结论。《礼》长于行，故可用以“节人”、“道行”；《书》长于政，而所记又为先王之事，故可用以“道事”；《诗》长于风，长于托物见志的风喻，故可用以“道志”、“达意”；《乐》长于和，故可用以“发和”；《易》长于变，故可用以“神化”、“道阴阳”；《春秋》辩是非，长于治人，故可用以“道义”、“道名分”。

《庄子》和《史记》论六经之用，原是一致的。《汉书·艺文志》也有一段论六经之用的话：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汉志》以“仁、义、礼、知、信”五常配六经，少了一样，所以加上一句“而《易》为之原”，至于《易》何以为《诗》、《书》、《礼》、《乐》、《春秋》五经之原，班固却说不出所以然来。班固作《汉志》，是根据刘歆《七略》的，我颇疑心这也是刘歆的说法，倒不如上述《庄子》、《史记》所论来得明确。

六经的次序，有两种不同的排列法：

(一)《易》、《书》、《诗》、《礼》、《乐》、《春秋》

(二)《诗》、《书》、《礼》、《乐》、《易》、《春秋》

主张第一种排列法的学者，认为六经是周公的旧典，所以依其制作的时代先后为次序：《易》原于八卦，八卦是伏羲画的，故列第一；《书》的第一篇为《帝典》，是记尧、舜的事的，故列第二；《诗》的《豳风》、《七月》是周末去豳迁岐时的作品，《商颂》是商代郊祀的乐章，故列第三；《礼》、《乐》是周公所制，故列第四、第五；《春秋》是孔子就鲁史记修成，故列第六。主张第二种排列法的学者，以为六经是孔子所作，用以教人的，所以依其本身程度的浅深为次序：《诗》、《书》是文字的教育，程度比较浅，所以排在前面；《礼》是约束人的行为的，《乐》是陶冶人的品性的，已是进一步了，所以列在其次；《易》明阴阳之变、究天人之际，如其拿现代的话来比喻，是从宇宙论以推论人生哲学，《春秋》则是孔子的政治主张，借褒贬往事以示其微言大义

的，所以连他门下列于“文学”一科的子游（言偃）、子夏（卜商）对于他的“笔则笔，削则削”都不能赞一辞，这两种书程度最为高深，所以列在最后。六经的次序有这两种不同的排列法，和上文所述解“经”的名称的二种说法是有关系的。

六经既是六种经书，为什么又有所谓“五经”呢？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乐经》这种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古书，六艺略于“易”、“书”、“诗”、“礼”、“春秋”五类都首云“经若干卷”，只有“乐”的一类没有说“经若干卷”，第一部就是“《乐记》二十三篇”。乐为什么没有经呢？这又有两种解说：一说，《乐经》亡于秦始皇的焚书；一说，乐本无经，只是附于《诗经》的一种乐谱。六经除了《乐》，便是“五经”。西汉时各经皆置博士，叫做“五经博士”。后来又有所谓“七经”者，其说不一：

（一）《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加上一部《论语》，便是七经（见《后汉书·张纯传》李贤注）。

（二）宋刘敞《七经小传》的七经是《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礼的一类他列了三部书，所以《易》和《乐》二者不在内了（王应麟《小学绀珠》的七经与刘敞同）。

（三）清圣祖康熙有《御纂七经》，是《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礼类仍有三部，又加了一部《易》，所以除去《论语》，仍是七经。

此外又有“九经”，也有不同的四种：

（一）宋刻巾箱本白文九经——《易》、《书》、《诗》、《春秋》、《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清秦镠所刻九经即据此本）。

（二）明张照奉敕刻的篆字九经——《易》、《诗》、《书》、《春秋》、《周礼》、《仪礼》、《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

学》、《中庸》合为一经)。

(三)明郝敬《九经解》——《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仪礼》、《论语》、《孟子》。

(四)清惠栋《九经古义》——《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谷梁传》、《论语》。

以上四种都是宋以后的人采辑的。南朝宋时，设国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论语》、《孝经》合为一经，名义上是十经，实际已有十一经了。唐文宗开成间石刻十二经，置于太学，则于十一经外又多一种《尔雅》(按《庄子·天道》已有“孔子翻十二经以说”老聃的话，说者谓六经加六纬是为十二经，与开成刻石的十二经不同)。十二经再加一部《孟子》，便是所谓“十三经”了。南宋光宗绍熙间已有《十三经注疏》的合刊本，成为经部的一部丛书。兹列述如下：

《周易正义》 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 汉毛公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徐彦，一说即北魏之徐遵明)。

《春秋谷梁传注疏》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 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 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此疏实非孙奭作）。

这部经类的丛书，经与疏本来是各别单行的，合刊本以宋光宗绍熙年间的为最早，其后又有十行本，明世宗嘉靖时又有据十行本重刻的闽本，神宗万历时又有据闽本重刻的监本，思宗崇祯时又有据监本重刻的毛氏（晋）汲古阁本，清高宗乾隆时有殷本（武英殿），嗣后有阮元所刻的阮本，这些都是《十三经注疏》著名的版本。阮本附有阮元的《十三经校勘记》，清人吴浩有《十三经义疑》，沈廷芳有《十三经注疏正字》，在校勘方面各有相当的成绩。

这十三部书并不能说都是正式的经，《周易》、《尚书》、《诗》、《周礼》、《仪礼》、《春秋》固然是“经”，《礼记》便是“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传”，《论语》也是“记”，《孝经》、《尔雅》的性质也和《礼记》差不多，《孟子》一书，宋以前和《荀子》同列于诸子类的儒家中，并没有算它是一部“经”。《春秋经传集解》曰：“传者，传也，博释经志，传示后人。”《礼记·曲礼》疏曰：“传谓传述经义，或亲承圣旨，或师儒相传，故谓之传。”《论语·学而》篇载曾子的话说：“传不习乎。”“传”字鲁《论》作“专”，《说文解字》说：“专，六寸簿也。”《春秋》之简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上文已经提到过，传只六寸者，取其便于携带，用以割录，正和现在学生听讲时用的札记簿一样。所以经传之“传”，原是解释经文的，例如《诗》有《毛公故训传》，《尚书》有伏胜的《尚书大传》，《仪礼》里有子夏的《丧服传》，都是解经之书。所以，《公羊传》和《谷梁传》是解

释《春秋》经的义例的，《左传》是详叙《春秋》经所记的事实以解经的，严格地说只能名之曰“传”，不能称之为“经”。至于“记”，则是孔子弟子及七十子后学所记，明非出于孔子。例如《论语》一书，便是纂辑弟子门人的记录而成；《礼记》所辑，更及于汉代诸儒所记；《尔雅》一书，亦明明有汉初叔孙通以后所增益的，所以都只能称之为“记”而不当尊之曰“经”。《孝经》一书，尤其可疑，六经尚且无以“经”为书名者（名之曰“经”，是后人所称），何以孔子独于答曾子问孝道而录成之书径自称曰“经”？总之，这些书只能目之为六经的附庸，而不应径名之为“经”。

四书几乎和五经列于同等的地位，在科举时代几乎是一种家弦户诵的书。所谓“四书”者，一是《大学》，一是《中庸》，一是《论语》，一是《孟子》。这是南宋孝宗淳熙间朱熹所定的。《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朱熹从《礼记》中特提出这两篇来，和《论语》、《孟子》配成四书。他认为，《大学》是曾子所作，《中庸》本是子思（孔伋，孔子孙）的作品，《论语》本是记孔子的言行的，《孟子》本是记孟子的言行的，他以为由孔子而曾子、而子思、而孟子是一脉相传的道统，所以这四部书是孔门正统的结晶品。子思困于宋而作《中庸》固然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大学》是否曾子所作却至今还是一个疑问，何况凭个人的臆测，把它强分做经一章、传十章，以为前者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后者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呢？难怪戴震小时候初读《大学》便要对朱熹之说发生怀疑了（戴震少时读《大学》至朱熹《章句》云“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问塾师曰：“何以知其然？”师答曰：“此先儒朱子云尔。”震又问曰：“孔子、曾子是何时人？”师答曰：“东周。”又问：“朱子何时人？”师曰：“南